

# 改革开放初期 邓小平对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的调整

武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西城 100009)

**[摘要]** 新中国成立后,就国际来看,朝鲜战争、台湾海峡危机、中苏边界冲突等严峻的国际形势,使得中国必须加快工业化的步伐以保证国家的安全和统一;就国内来看,我们选择了比资本主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它可以保证我们的发展速度、发展效益要比资本主义好,可以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可以摆脱贫穷过上富裕生活。因此,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干部始终存在着加快经济发展的紧迫心情和强烈愿望,这种愿望在1978年以前主要表现在经济计划和发展目标过高,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运行中的“供给约束型”。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制定阶段性经济发展目标,对于避免和减轻因“急于求成”而导致的经济波动就十分重要。

**[关键词]** 邓小平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经济目标

**[中图分类号]** D616/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01(2014)03-0058-07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大国,一方面继续面临着来自外部世界对国家安全和统一的威胁;另一方面人口多、底子薄的经济落后状况制约着中国的发展,在这种情形下,如何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赶上和超过世界发达国家,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而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一贯追求的目标。从民主革命和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以后党立即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到1958年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再到改革开放以后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都反映了加快经济发展的要求,这也代表了中国人民的要求,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的本质。但是,事物总是有两个方面的作用,在上述思想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改

革发展的强大动力,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同时派生了党内的急躁情绪,乃至出现脱离现实国情的“高指标”、“大干快上”等发展冲动和偏差,导致新中国经济发展中多次出现波动和被迫调整,并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 一、新中国的发展战略和难以克服的急于求成

实现经济上赶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它不仅是这些国家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生存的需要,可以说,经济发展速度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死存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产生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被侵略、被压迫者,是

**[收稿日期]** 2014-04-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产业结构演变中的大国因素研究”(11BJL01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武力(1956—),男,安徽宿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由民族、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因此当这些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还面临着本该由资本主义时期完成的工业化任务,而这些国家的工业化任务,与依靠外部资源和市场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相比,任务十分艰巨。同时,世界两大阵营的对立和战争威胁,使得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任务也更加迫切。社会主义只有在经济发展上表现出超过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和速度,才有可能存在和发展。这是赶超战略形成的根本原因。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多民族、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自然也面临着快速实现工业化的艰巨任务,同时国家尚未统一和严峻的国际环境使得国家安全问题更加突出,这些都使得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上的赶超战略。这个赶超战略的形成,以“一五”计划为标志,可以简单概括为:主要依靠国内积累建设资金,从建立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入手,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实施“进口替代”政策,通过出口一部分农产品、矿产品等初级产品和轻工业品换回发展重工业所需的生产资料,并用国内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代替它们的进口;改善旧中国留下的工业生产布局极端不合理和区域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畸形状态;随着重工业的建立和优先发展,用重工业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装备农业、轻工业和其他产业部门,随着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以及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逐步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逐步改善人民生活。这种赶超战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高速度发展为首要目标。(2)优先发展重工业。(3)以外延型的发展为主。外延型的发展是指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是靠增加生产要素。(4)从备战和效益出发,加快内地发展,改善生产力布局。(5)以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为目标,实行进口替代。由于实行赶超战略,加上单一的公有制,因此在经济发展上就呈现出“投资饥渴症”和“资源约束型”的经济波动,而供给短缺则成为常态。

在制订和实施“一五”计划期间,核心问题还是如何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紧迫性,毛泽东在1956年的话很具有代表性:“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sup>[1]</sup>

中国与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之所以选择社

会主义和实施计划管理,重要原因就是要通过这种制度,主要依靠国内的积累和集中资源,在社会安定的前提下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因此,我国从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始终将加快经济发展和早日实现工业化作为第一目标。“一五”和“二五”计划是以15年左右实现工业化为目标;“三五”、“四五”、“五五”是以20世纪末基本上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目标。

粉碎“四人帮”以后,领导层和群众中普遍存在着要求加快建设速度,“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补上去”的良好愿望,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也是一致的。经济形势在原来低起点上的较快好转,使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头脑中产生了急于求成的情绪。1977年2月15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汇报1977年经济方针,提出要调整经济部署,整顿企业。3月1日中央政治局讨论时,华国锋说:“今年有调整的意思,但考虑来考虑去,没有提调整。今年经过努力,要前进,而且为今后三年更好完成五年计划打基础。要积极一点,要看到困难,更要看到有利条件、有利因素。”于是,1977年的经济方针只确定要整顿企业,不提调整经济。这个当时尚属谨慎的设想很快又被突破。

4月19日,粉碎“四人帮”刚刚过去半年,《人民日报》就发表了题为《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的社论,提出:“一个新的跃进形势正在形成”。要求“赶超‘三个水平’”,即“首先达到和超过本单位历史最高水平,再赶超全国同行业的最高水平,进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1977年9月11日,华国锋召集国务院负责人举行会议,研究加快建设速度问题。他批评国家计委提出的工业增长幅度“太保守”,要求“要开足马力,挽起袖子大干”,“明年的积累要加快”。他还说,不能满足今年工业增长10%,要争取更高速度,12%的速度也不满足,要争取更高的速度。甚至说:“假如工业只增长10%,你们就不要来向政治局汇报”。<sup>[2]</sup>

随后,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要求用“革命加拼命的精神,争时间,抢速度,大大加快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步伐”。1978年的元旦社论把这个建设速度问题提得更高:“建设的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我们不能满足已有的成绩,一定要有一个高速度。这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无产阶级

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需要”。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一个新的跃进形势已经来到了。”这成了当时经济工作的总体方针。

急于求成表现在规划上,是修改和执行《十年规划纲要》中提出的违背中国现时国情、超过国家综合国力的经济跃进计划,制定了一大批经济建设的高指标。表现在方法上,是继续采用投入大量资金、人力搞“大会战”的“大跃进”运动。与以往经济过热表现不同的是,这次跃进还表现在依赖大量借贷外国资金、引进外国设备,因此后来又被人称为“洋跃进”。

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1976—1985)》是1975年国家计委拟定并经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当时还难以摆脱“文革”的政治压力进行科学论证,已经存在着指标过高的问题。随后的1976年,由于政治动荡和唐山大地震,实际上已经降低了指标预期。到1977年时过境迁,已经不具有可行性了。然而,这个《纲要》仍然被当作总体规划考虑。

1977年11月18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了今后23年的设想和“六五”计划,经过讨论,得到批准。11月24日至12月11日,全国计划会议研究了长远规划,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汇报要点》建议:“今后到2000年的23年中,分三个阶段打几个大战役,到本世纪末使我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具体安排是:第一阶段即1978—1980年的头三年,重点抓农业和燃料、动力、原材料工业,使农业每年以4%—5%、工业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大步前进。第二阶段即1981—1985年,展开基本建设的大计划,工业方面要建成120个大项目,包括30个大电站、8个大煤炭基地、10个大油气田、10个大钢铁基地、9个大有色金属基地、10个大化纤厂、10个大石油化工厂、十几个大化肥厂,新建和续建6条铁路干线,改造9条旧干线,重点建成秦皇岛、连云港、上海、天津、黄埔等5个港口。这一阶段,粮食生产要达到8000亿斤,钢铁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原油要达到2.5亿吨。第三阶段,在2000年以前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这个不切实际的过高指标计划是在有关部门更

高的规划基础上制定的。10月,煤炭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时提出,“要拿下前所未有的高速度”,1987年煤炭产量要突破10亿吨,赶上美国。冶金部在汇报中提出,到1985年钢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力争7000万吨,到本世纪末要建成二十几个鞍钢。1978年1月,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强调指出,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是“毛泽东主席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的伟大号召”,要全党动员,苦战三年,使1980年全国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70%左右,大中型拖拉机拥有量增长70%,手扶拖拉机拥有量增长36%,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32%,化肥年产量增长58%<sup>[3]</sup>。

1978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高指标的《汇报要点》,并与1978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一起下达,要求贯彻执行,并写进了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稿。关于引进,中央政治局一致认为要抓紧时间,加快谈判,加大规模。1978年3月,全国第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高指标的《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华国锋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现出了乐观的态度,他说:“实现了十年规划,我国经济技术水平将发生巨大变化,物质基础会雄厚得多,就有把握再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努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十年规划和二十三年设想提出的任务是宏伟的,也是完全能够做到的。”他的依据,仍然是学大庆、学大寨:“大庆油田产量在十七年间平均增长28%,大寨去年平均每人生产粮食2000多斤,如果我们所有企业、社队都能向他们看齐,我们国民经济将会出现一个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景象啊!”

从当时的经济状况看,要实现这一系列计划指标是不符合实际的。1978年国民经济虽然比“文革”时期有了较大好转,但多年积淀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主要反映在农轻重比例失调上。农业方面,农产品严重不足,很多农村地区还存在着吃饭问题,需要国家救济,外出逃荒讨饭现象严重。为了保证供应,国家全年进口粮食139.1亿斤、棉花1901万担、油5.8亿斤、食糖123.8万吨,共用外汇21亿元。大寨的成就,后来被证实有较大的水分,而且得到国家投资的特殊照顾。当时全国只有1600个农机制造厂、2700个农机修造厂,进行小规模简单农机制造修配。在这样的条件下,三年实现农业机械化显然是不可能的。据估计,实现中等标准的机械化每亩需投资300元,而当时每亩年积累不到6元。工业方面,重工业虽然得到一定发

展,内部比例也很不协调,机械加工能力超过了钢铁工业所能提供的原材料,不得不进口解决。能源工业与其他工业比例严重失调,大庆油田的成就是显著的,但也有其特殊性,较多地依靠自然资源的储藏和采掘,建设十几个大庆并没有得到地质勘探结果的支持,况且,能源工业的单方面发展,并不能直接带动钢铁、机械制造等基础工业的同步发展,对电子、纺织等轻工业的影响更小。科技力量和工艺、管理水平方面也没有可能对全面跃进予以足够的支持。

## 二、“文革”后开眼看世界和解放思想第一人

1960年代以来,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国陷入了一个经济上对外相对封闭的状态,尤其是“文革”极左错误的影响,即使在1972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及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大为缓和以后,中国对西方世界战后变化的了解还是受到很大局限。而邓小平自1974年复出后即参与外事工作,1975年率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取得道法国,成为中国高层领导集体中最早出访和了解外国的人。1977年邓小平再次复出后,他继续抓外事,仅在1978-1979年间,就先后访问了朝鲜、日本、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等,加上他早年留学法国,使得邓小平成为1976年以后中共领导集体中最先开眼看世界、最了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状况的人。

1964年,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代表中央政府第一次宣布了两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国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sup>[4]</sup>。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两步设想”:第一步,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一方面为抵制“四人帮”的破坏,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性,例如在1975年3月指出,距离把我国建设成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

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sup>[5-1]</sup>。另一方面,他自己又保持着头脑清醒,例如他在同年10月7日会见英国保守党上院领袖卡林顿时就说:说赶上西方,就是比较接近,至少还要五十年。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清醒的估计<sup>[8-1]</sup>。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出现的“大干快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热潮也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1977年9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时,在谈到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问题时,邓小平指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毛主席、周总理生前提出的计划、设想。由于“四人帮”的干扰,不仅耽误了时间,而且受到相当的破坏。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和破坏的东西抢回来<sup>[6-1]</sup>。

邓小平在1977年恢复工作并主抓教育、科研和外事过程中,对中国经济、教育和科技落后的情况比较清楚,针对国内不少人不清楚或不敢承认这个问题,他多次讲这个问题。1977年9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时说:“1975年我曾讲过,同日本相比我国落后了50年。那时我老想抓科研,结果不仅没有抓上去,反而我自己被抓下去了”。<sup>[6-2]</sup>后来又讲:有些人专门搞形而上学,什么都自己第一。20年代我出国就是坐的5万吨邮轮。凤庆轮一万吨还没过关就吹起来了。江青责问我,我就和她辩论<sup>[6-3]</sup>。在29日下午会见参加国庆28周年的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旅行团部分成员时就指出:“世界发展到了什么样子,他们不知道,也不敢知道。我们要承认落后,不要怕丑。最近我跟外国人谈话都是讲这些话,有些外国朋友觉得惊奇。这有什么惊奇?承认落后就有希望,道理很简单,起码有个好的愿望,就是要干,想出好方针、政策和办法来干”。<sup>[6-4]</sup>10月7日,会见日本三冈访华团在谈到科技现代化时又说:“科学本身就是老老实实的,一点弄虚作假也不行。不行就是不行,再吹也不行。知道自己不行,就有希望”。<sup>[6-5]</sup>1978年2月9日,在参加政治局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草案)》经济部分的会议时,针对报告中关于到20世纪末“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将大大提高,三大差别将显著缩小”的提法,指出:“还是说稳当一点好。我们的总产值达到美国的水平,按人口平均也比美国差得多。“三大差别将显著缩小”这句话可以删掉”<sup>[6-6]</sup>。

1978年5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总

统特使时又说：“过去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就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连世界是个什么样子都不清楚。如果说60年代前半期我们同世界技术上的发展有些差距，但不很大，那么，这十多年则拉得很大。”<sup>[6-7]</sup>

10月22-29日，邓小平应日本政府邀请访问日本，这是他继1975年参加联合国大会去美国和顺道经过法国后，再一次访问经济发达国家，访问期间，邓小平再一次亲身感受到中国经济与日本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开眼看世界，实事求是地承认自己落后，实际上成为邓小平解放思想、大力提倡恢复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现实基础，也是他后来提出“小康”目标的客观依据。

### 三、邓小平对“四个现代化”目标的修订

1964年，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代表中央政府第一次宣布了两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国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sup>[4]</sup>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两步设想”，第一步，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同年3月为了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性还特别指出：“距离把我国建设成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sup>[5-1]</sup>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出现的“大干快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热潮也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1977年9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时，在谈到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问题时，邓小平指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毛主席、周总理生前提出的计划、设想。由于“四人帮”的干扰，不仅耽误了时间，而且受到相当的破坏。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和破坏的东西抢回来”。<sup>[6-1]</sup>

“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国民经济增长缓慢，从1967至1976年（考虑到“文革”在1966年年中虽已开始，但经济尚未受到严重冲击，当年不计入内），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6.8%，其中1967年、1968年出现

倒退，分别比上年下降9.9%和4.7%，1974年和1976年比上年分别只增长1.9%和1.4%。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7.1%，国民收入（净产值）年平均增长4.9%。10年中，国民经济收入总量虽然有增加，但是企业管理制度的破坏和比例失调也使消耗、浪费现象严重，经济效益降低。以1966年和1976年的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各项指数相比，每百元资金实现的税金和利润由34.5元下降到19.3元，减少44.1%。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住宅、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等方面也造成了严重欠账。“文革”前经过三年调整，供应的商品本来已经有不少取消了配给票证，“文革”时期又不得不恢复甚至增加。住房紧张，老少三代同居一室，甚至“四世同堂”现象也十分普遍。

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周边的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在1960年代以后快速崛起，称之为“亚洲四小龙”。这些国家和地区在1960-1970年代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但在这之前他们只是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它们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吸引外国资本和技术，利用本地的劳动力优势适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使得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

1978年9月12日，邓小平访问朝鲜，他在同金日成会谈时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sup>[6-8]</sup>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邓小平也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仍然将加快经济发展作为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基本标志和最迫切任务。邓小平再三强调：“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sup>[7-1]</sup>“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sup>[5-2]</sup>邓小平还将经济发展速度提高到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大问题：“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sup>[15-3]</sup>

但是,与过去相比,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则由过去超过可能调整到比较切实可行。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经济发展目标长期超出了国情和经济发展的实际可能,这种过高的目标既来源于急于求成的思想,反过来又促进了急于求成的心态,并成为制订经济发展计划和政策的依据,成为1978年以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则根据实际调整了过去的高指标。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就国民经济的调整发表讲话指出,过去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摆脱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而没有按比例发展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确实可靠的高速度。看来,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农业、工业、基建、交通、内外贸易、财政金融,在总的前进过程中都还需要有一段调整的时间,才能由不同程度的不平衡走向比较平衡<sup>[15-4]</sup>。

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提出了“小康”概念和20世纪末中国经济要达到的目标,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美元。这个思想经过完善,形成了明确的“三步走”战略,并得到全党的认同,从而将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目标落在了比较实在的基础上,消除了长期以来“急于求成”的思想根源,使均衡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为可能。1980年10月,邓小平在与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就指出:“年度计划、五年计划、十年规划,中心和重点不要多考虑指标,而要把人民生活逐年有所改善放在优先的地位。”<sup>[18-2]</sup>

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在对全国形势作了符合实际的估量的基础上,作出了“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的重大决策。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要通过调整,继续摆脱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缚,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然后着手编制切实可行的第六个五年计划。”<sup>[15-5]</sup>

1979年初,邓小平出访美国、日本,目睹了其现代化发展水平,特别是在参观日本大型企业时很受触动,耳闻目睹西方现代化的现状,邓小平坚定了1975

年四届人大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时他的清醒估计:中国即使比较接近西方,至少还需要五十年。3月21日,邓小平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委会代表团时,开诚布公地告诉来宾,中国现代化的概念与西方不同,中国定的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其实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sup>[18-3]</sup>。10月4日,邓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讲话,他幽默地说:“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是狮子大开口,我后来把标准放低了,改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sup>[18-4]</sup>这就说明,邓小平出访美、日后看到了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水平,清醒地意识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不可能性,因此邓小平改口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也就是他对大平正芳说的“小康之家”。

“小康社会”作为一个上承贫困、下启富裕的温饱型社会,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中不可逾越的初级阶段,是20世纪新中国的基本国情,这个目标的提出反映了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精神。

1981年4月14日,邓小平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对“中国式的现代化”作了更详细的阐述,他说:“我们讲四个现代化,开始的时候提出的是一个雄心壮志。但我们一摸索,才感到还只能是中国式的现代化。讲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就是在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不能达到日本、欧洲、美国和第三世界中有些发达国家的水平。到本世纪末,我们只能达到一个小康社会,日子可以过。邓小平认为经过这一时期的摸索,我们设想十年翻一番,两个十年翻两番,就是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千美元也不容易,如果八百,也可以算是小康生活了。”

根据邓小平建议,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报告提出了从1981年到2000年的20年里,争取工农业总产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这个目标的提出,并不是“拍脑袋”和主观臆断的结果,而是经过深入研究和计算的。一方面借鉴了日本60年代实施的国民经济“倍增计划”经验;另一方面,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1982年11月19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保证》,即反映出当时论证的严谨性。这篇文章也得到了陈云、姚依林等长期从事经济领导工作的赞同。

1984年,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再次提到小康社会,他言简意赅地说道:“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人均达到八百美元,中国就建立

了一个小康社会,这也是中国式的现代化。”<sup>[7-2]</sup>

1987年4月,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副首相时第一次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的设想,即从1980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第一个十年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翻一番,第二个十年在此基础上再翻一番,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然后第三步是在21世纪用3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指出:“总的说我们的情况是好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实践证明这些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但毕竟我们只是开步走。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目标不高,但做起来可不容易。”

综上所述,邓小平“小康”概念的提出,并不是对中国传统词语简单随意的沿用,而是开眼看世界、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产物,是他对中国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进行重新审视、定位的结果。“拿国

际水平的尺度”<sup>[5-7]</sup>来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坐标系,而不是空喊现代化,这也反映了邓小平反对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作风。在现代化的国际参照标准方面,邓小平曾提出过“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水平”<sup>[5-8]</sup>、“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sup>[5-9]</sup>等几种设想,而最终他确定了“中等发达国家”<sup>[5-10]</sup>这个标准。邓小平曾充满自信地说:“我可以大胆地说,到本世纪末,中国能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也就是我曾经跟大平正芳先生讲的达到小康水平,那时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sup>[7-3]</sup>可以说,“小康”概念内涵的拓展始终是在与国际性的横向比较中获得的。邓小平采用了国际上通用的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准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此前用“人均收入”),这就为原本很抽象的社会发展目标确定了一个具体的标尺(例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1000美元),这使现代化目标既易于为民众所掌握,又便于与世界各国作对照,还能根据各种具体情况的变化而适时进行新的调整<sup>[9]</sup>。

如果从更深的理论层次来看,邓小平提出“小康社会”目标来替代“四个现代化”目标,是从生产力水平视角来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不可动摇的基础,如果中国连小康社会水平都没有达到,怎么能够支撑起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呢?在这里,历史与逻辑实现了高度的统一:20世纪发展目标的调整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七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89.
- [2] 国家计划委员会档案.粉碎“四人帮”以后经济指导工作中的问题[Z].1980-11-15.
- [3] 《当代中国的计划工作》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Z].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384-388.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选集:下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19.
- [5]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2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sup>[-1]</sup>,312-314<sup>[-2]</sup>,128<sup>[-3]</sup>,161<sup>[-4]</sup>,356<sup>[-5]</sup>,164<sup>[-6]</sup>,270<sup>[-7]</sup>,237<sup>[-8]</sup>,417<sup>[-9]</sup>,266<sup>[-10]</sup>.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98<sup>[-1]</sup>,210<sup>[-2]</sup>,245<sup>[-3]</sup>,211<sup>[-4]</sup>,217<sup>[-5]</sup>,267<sup>[-6]</sup>,316<sup>[-7]</sup>,360<sup>[-8]</sup>.
- [7]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3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5<sup>[-1]</sup>,54<sup>[-2]</sup>,105<sup>[-3]</sup>.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21<sup>[-1]</sup>,172<sup>[-2]</sup>,111<sup>[-3]</sup>,132<sup>[-4]</sup>,187-188<sup>[-5]</sup>.
- [9] 赵美岚,黎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概念的典范创造——以邓小平“小康”概念的形成过程为分析范本[J].南昌:江西社会科学,2012,(11).

(责任编辑 毛强)